

明朝的内阁和清朝的军机处

◎张飞燕

内阁制度出自翰林，而翰林作为皇帝的顾问和秘书，起源于唐高宗时期。高宗时，选择一些有才识的文人在北门待诏，“朝廷疑议表疏，皆密使参处，以分宰相权”。北门是皇宫的后门，入门便是禁中，所以时谓“北门学士”。玄宗时别置翰林院于禁中，专掌“内命”。至此，翰林院就成为皇帝直接控制的最高秘书机构，与当时的宰相机构中书门下形成双轨辅政局面。唐朝设置宰相，军国大政，决于中书门下，翰林学士虽“晓达机谋，天子机事密命在焉”，但却始终没有突破“内相”这一界限。

明朝时，明太祖总结前朝经验，认为外廷宰相是皇权的首要威胁，因此废除丞相制。明成祖朱棣即位之后，任命解缙、黄淮、杨荣等七人入值文渊阁，参预机务，内阁作为一种制度开始出现。然而其品秩不过五品，均挂衔翰林而无公开身份。从性质来说，近于皇帝的顾问和机要秘书。但是，内阁的实际作用却远远超过它的公开地位。明成祖“军务悉委荣，昼夜见无时”，“凡宣诏出令，必得荣奏乃发”，“天下事咸朕与若等共计，非若六卿之分理也”。之后继位的洪熙皇帝提高了内阁的地位，将大学士们从五品拔擢为三品，宣德皇帝使内阁大学士兼有各部尚书衔，自此阁权日重，内阁制度趋于定型。

内阁制度确立之后，内阁大学士便奉命处理重要政务，掌握了票拟权，“纶眼批答，裁决机宜，悉由票拟”，其地位已非唐宋时期的翰林学士能比。在明朝，各级官僚无论大小事务都要向皇帝报告，送入宫中的题奏一般发往内阁，由内阁用墨笔在纸条上拟旨，然后贴在题奏上交皇帝审定，这就是“票拟”。皇帝在所拟旨上用朱笔批改，这就是“批朱”。宣德以后，皇帝大多懒惰，疏远内阁，本来“照阁票批朱”的司礼监秉笔太监由于掌握了批朱权，权势日盛。可见，内阁虽地位尊崇，职权重要，但却不同于以往的宰相，既不统驭六部，又受制于内监。

关于内阁的办公地点，内阁的“内”，其实就是内廷、禁中或大内之意。至于具体场所，《明会典》谓“直文渊阁”，然

而文渊阁原是翰林院办公之处，人员嘈杂，非“密勿之地”。内阁大学士杨士奇的《御书阁颂有序》中写道：“太宗皇帝入继大统，……初建内阁于奉天门内。”明确指出当时的内阁是在奉天门内，而不是在奉天门外的文渊阁。永乐年间的文渊阁庶吉士王直为杨士奇作传，进一步指出，“太宗皇帝即位，遂擢为编修，时开内阁于东角门内，命解缙、杨荣等七人处其中，典机务。”而从内阁的活动情况来看，皇帝与内阁“昼夜见无时”，“昼夜相共事，鲜离左右”。

正统十四年(1449年)，侍讲刘定上疏景帝：“凡政有早朝不可决者，宜日御偏殿，使与大臣敷奏。”弘治六年，谕德曾彦上疏：“今诸司疏，皆蒙令所司议处，乞御偏殿，宜召内阁及府部大臣相与参决。”这些建议，实际上是要求恢复永乐时皇帝召内阁臣御前议事的旧制。可见，阁臣参预机务皆在御前进行，文渊阁只是内阁平时待诏之处，是“直”文渊阁而不是“于”文渊阁参预机务。内阁建置之初，阁臣并不在文渊阁参预机务，文渊阁为内阁官署，乃在宣德、正统之后。

内阁最初建立时，实际上是翰林院的一个负有特殊职责的分支机构。仁宗即位后，命杨士奇等“悉掌内制”。宣德年间，宣宗命阁臣代为批答部分奏章，阁臣的办事方式，逐步由“日侍左右，参预机务”，向独立批答演变。其办公地点，也自然由御前转为文渊阁。为了适应内阁的这一变化，宣宗于宣德四年(1429年)至文渊阁议事时，命扩大文渊阁的规制，赐文渊阁印，增设诰敕、制敕两房中书舍人为内阁属臣。但在这时，内阁还需与翰林院在文渊阁合署办公，直到宣德七年翰林院新署落成，翰林院迁出，文渊阁遂正式成为内阁官署。所以，在当时杨士奇、王直等人的记述中，凡追记永乐时参预机务的地点，皆云“东角门内”、“奉天门内”等而不言文渊阁，而后人记正统以后的内阁，则直言“文渊阁”了。

内阁活动由御前移至文渊阁，一方面，内阁建置由临时性设施成为永久性机构，内阁拥有自己的官署和属臣，在文渊阁独立专掌票拟，且票拟不在御前受命进行，反映